

中国 劳动力市场： 前景、问题与对策

主编 / 李建民 副主编 / 黄 乾

南开大学 出版社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劳动力市场：前景、问题与对策

主 编 李建民

副主编 黄 乾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劳动力市场：前景、问题与对策 / 李建民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310-03472-7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劳动市场—中国—文集
IV. ①F249.2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744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泰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3.125 印张 2 插页 436 千字

定价：3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前 言

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阶段。首先，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发生变化。针对未来劳动力供求变化趋势，国内存在“劳动力短缺论”和“劳动力供大于求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管哪种观点正确，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人口转变的快速完成，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低生育、低死亡、低增长阶段，人口发展和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决定了后人口转变时期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必将发生明显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为劳动力规模的变化，也体现在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受制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更面临着特殊的制度约束，这决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较强的波动性。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发展态势的变化、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开始从“需求主导型”向“供给主导型”转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这个群体具有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经济社会特征和行为，面临不同的经济环境与就业环境，其劳动供给行为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就业形势，乃至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再次，就业形势更复杂。当前和未来中国就业形势不仅面临劳动力规模问题，而且面临劳动力结构的挑战，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更突出；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日趋复杂；此外，国际经济将加深对中国就业形势的影响。最后，人力资本提升和效能发挥更显重要。在经历了 30 多年高速经济发展以后，中国经济面临着如何保持持续增长的重大问题。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中国而言，这个关键因素无疑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推进器”。

在上述背景下，科学认识和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新阶段面临的形势、问题和发展趋势，及其所带来的挑战，深入研究应对挑战之策，对于经济持续增长、劳动力市场发展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后，上述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基于此目的，中国人口学会和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 2009 年 9 月 25~26 日在南开大学召开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前景、问题与对策”研讨会。来自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湖南大

学、河海大学、河北大学、广东社会科学院等 20 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书的出版就是缘于这次会议。

本书共收录了 30 篇论文，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重点探讨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问题，主要涉及了金融海啸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劳动力市场统计等主题。下篇重点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主要涉及人口变动、流动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核算、人力资本集聚与提升，以及人口红利等议题。相信这些成果对于科学把握中国劳动力市场新阶段的基本趋势，解决劳动力市场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提供未来劳动力市场发展所需的制度创新，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最后，感谢中国人口学会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对研讨会给予的大力帮助。

编者

2010 年 5 月

目 录

前 言

上 篇 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

中国 30 年经济增长与就业：构建灵活安全的劳动力市场	3
张车伟	
建议在“十二五”规划中采用城镇调查失业率为约束性指标	19
杨宜勇 顾 严	
金融海啸以来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	26
李建民 黄 乾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挑战——基于中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 反思视角	39
孔令锋	
哪些女性农民工易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基于对湖北省回流农民工的调查	54
石智雷	
金融海啸对中国劳动就业形势的影响	66
李燕铃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探究	76
李相虎	
中国非农化农村劳动力的规模变动与特征分析	84
童玉芬 王 箐 孙同德 王红涛 阎 涛	
北京市农民工生活方式五年间转变的实证研究	96
纪 韶 李舒丹	
滨海新区功能区外来务工人员主要特征探析	108
吴 帆	
现阶段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问题研究	116
朱镜德	
空缺和能力双重竞争下的女大学生就业难的系统分析	126

王兆萍	
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影响因素与适度性分析	135
张建武 范秀燎 徐远强	
失业属性：一个应予关注的理论范畴	146
杨成钢	
基于人力与自然力互补原理对充分就业问题的重新思考	152
罗丽艳	
劳动力市场监测指标体系初探	160
王 静	
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效率分析	178
田大洲	

下篇 中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

中国人口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189
于学军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影响分析	198
陆杰华 薛伟玲	
人口红利论可以休矣：机器的红利与人口的重负——兼论加速实现人口 零增长的必要性及对策	207
李小平	
人口安全与人口老龄化——基于杭州的研究	233
徐祖荣	
江苏省人口素质水平评价研究	246
屈云龙	
基于受教育程度、工龄和收入的人力资本核算研究	255
王金营 徐 蕾	
集聚效应对人力资本流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279
胡永远 熊 莎	
发展中少数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形式探讨——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	288
杨润高	
西部地区城市化与人力资本集聚机制研究	298
贾冀南 王金营	
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合约——引入不对称信息的敲竹杠模型	311

李晓颖	
不同户籍劳动力的城镇就业机会与收入差异	326
刘 毅	
谁占主导：政府抑或市场——浅议水库移民劳动力培训管理的主导力量	347
许佳君 李艳艳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下的教育结构改良刍议——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视角	355
梁同贵	

上 篇

中国劳动力市场与就业

中国 30 年经济增长与就业：构建灵活安全的 劳动力市场

张车伟

一、经济增长创造就业了吗

中国过去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观察劳动力市场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和增长停滞的最好例证。为了追求绝对公平、消除失业并实现“充分就业”，计划经济实施了完全的就业保护制度：劳动力市场只进不出，工资长期维持“低水平”，保险和福利完全由国家计划来保证，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找到正式工作似乎就端上了“铁饭碗”（杨宜勇，2002），劳动力市场彻底僵化。

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从根本上抹煞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导致了经济效率的巨大损失，同时更无法解决就业问题，“充分就业”只能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自欺欺人，冷酷的经济现实是失业从“显性”变成“隐性”，数量庞大的劳动大军组成了浩浩荡荡的失业大军。“大跃进”时期农村劳动力的先“进”（城）后“退”（回农村），“文化大革命”时期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都是当时城镇失业形势严重恶化的真实写照。1962~1979 年的 18 年间，城镇共有 1776.48 万人（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1987）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农村也因此成了吸纳隐性失业人员的“蓄水池”。

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遭到彻底扼杀的情况下，计划经济制度为追求经济增长不得不把投资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部门严重倾斜，这样做虽然带来了短暂经济增长，但代价是经济结构被严重扭曲和经济效率低下，陷入经济停滞和就业匮乏的社会危机是其必然的归宿。无法解决就业问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失败，劳动力市场僵化是导致这一失败的最重要原因。

改革并没有急于破除旧的计划体制，也没有过早触及城镇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而是采取渐进的增量改革方式。改革选择以农村为突破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刺激了农村经济发展，增强了农村经济增长的活力，带动了全国

经济的高速增长。

1978~1989年，GDP年均增长9.72%，其中第一产业年均增长5.22%，第二产业年均增长10.82%，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2.39%。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从1978年到1990年，全国就业总量从40152万人增加到64749万人，净增加24597万人，年平均增加2050万人。其中城镇部门净增就业7527万人，年均增加627万人；农村就业净增加17070万人，其中农村农业就业净增加9028万人，年均增加752万人，农村非农业就业增加8042万人，年均增加670万人。如果把城镇就业与农村非农就业合在一起，则总非农业就业在12年时间内净增加15569万人，年均增加1297万人（参见表1）。就业的高速增长很快使城镇劳动力供不应求，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快，20世纪80年代甚至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的“民工潮”。劳动力从效率低的农业部门向效率高的非农业部门转移，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有效地缓解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使得劳动力资源得到更加充分利用。

表1 1978~1990年就业数量变化（万人）

年份	就业总量	城镇就业	农村就业		非农就业 合计
			农业	非农业	
1978	40152	9514	27811	2827	12341
1980	42361	10525	28836	3000	13525
1985	49873	12808	30086	6979	19787
1990	64749	17041	36839	10869	27910
1978~1990 净增加	24597	7527	9028	8042	15569
年平均增加	2050	627	752	670	1297

注：农村就业分为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其中农村非农就业主要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人企业和个体就业等。“非农就业合计”是城镇就业和农村非农就业的合计数。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表现出很强的关联性。1978~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高达0.62，也就是说，GDP平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增加0.62个百分点。如此高的就业弹性系数恐怕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少见的。由此可见，1978~1990年间的经济增长不仅创造大量就业，而且是一种最大化就业的增长，展现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威力。

经济增长和就业在改革早期阶段之所以能展现出如此强的相关性，一方面固然体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但还有一个原因不得不提，那就是我国的改革尚没有触及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僵化劳动力市场。当改革不得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下

形成的“存量”部分时，社会就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阵痛。这种阵痛突出地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大量冗员随着改革深化不断被释放，造成大量人员下岗和失业。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相关性因大量裁员的“稀释”而开始变弱。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尤其是 1998 年国有企业改革改革步伐加快后，中国经历了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裁员。1998~2002 年，国有单位就业净减少 4051 万人，集体单位就业净减少 2163 万人，短短 5 年左右的时间，城镇部门有大约 6000 万人丢掉了工作。正因为如此，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冲击所掩盖，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大幅度减弱（参见表 2）。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虽仍在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但改革的“冲击”也在同时摧毁大量就业岗位，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统计关系无法反映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

表 2 经济增长与就业：就业数量与就业弹性变化

年份	就业数量（万人）		就业弹性			
	总量	年新增	总弹性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40152	--	--	--	--	--
1979	41024	872	0.28	0.18	0.45	0.71
1980	42361	1337	0.40	-1.15	0.47	1.07
1981	43725	1364	0.59	0.32	1.98	0.67
1982	45295	1570	0.38	0.30	0.74	0.18
1983	46436	1141	0.23	0.11	0.37	0.51
1984	48197	1761	0.24	-0.07	0.66	0.76
1985	49873	1676	0.25	0.46	0.41	0.41
1986	51282	1409	0.31	0.12	0.73	0.43
1987	52783	1501	0.25	0.27	0.32	0.43
1988	54334	1551	0.25	0.71	0.24	0.41
1989	55329	995	0.44	0.96	-0.39	0.36
1990	64749	9420	3.79	2.00	4.28	6.61
1991	65491	742	0.12	0.20	0.08	0.36
1992	66152	661	0.07	-0.22	0.11	0.44
1993	66808	656	0.07	-0.58	0.21	0.62
1994	67455	647	0.07	-0.72	0.12	0.79
1995	68065	610	0.08	-0.62	0.16	0.82
1996	68950	885	0.13	-0.40	0.28	0.62
1997	69820	870	0.13	0.02	0.20	0.26
1998	70637	817	0.15	0.27	0.04	0.27

(续表)

年份	就业数量 (万人)		就业弹性			
	总量	年新增	总弹性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9	71394	757	0.14	0.59	-0.13	0.19
2000	72085	691	0.11	0.32	-0.13	0.32
2001	73025	940	0.16	0.46	0.05	0.20
2002	73740	715	0.11	0.33	-0.32	0.39
2003	74432	692	0.09	-0.35	0.15	0.35
2004	75200	768	0.10	-0.57	0.45	0.52
2005	75825	625	0.08	-0.73	0.55	0.30
2006	76400	575	0.06	-0.87	0.46	0.28
2007	76990	590	0.06	-0.96	0.51	0.10

注：1990 年数据为奇异值，这与该年进行的统计口径调整有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就业弹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接近尾声，2002 年后城镇就业净增加速度不断加快，表现为二、三产业部门的就业弹性不断增加，其中第二产业增长尤其明显。2003～2007 年的 5 年间，年平均就业弹性高达 0.42，其中 2005 年、2006 年和 2007 年分别为 0.55、0.46 和 0.51。经济增长又开始展现出强的就业拉动效应，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也开始还原出二者之间本应有的真实面目。

在分析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关系时，另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农业部门所扮演角色的变化。改革开放早期，农业经济增长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表现为就业的净吸纳者，但 1990 年后，农业逐渐从吸纳就业转变为排斥就业，尤其是在城镇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时候，农业排斥就业的作用就愈发明显。农业部门创造就业作用的变化是 1990 年后经济增长就业弹性降低的重要原因。总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 2006 年和 2007 年降低到只有 0.06，很多人也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没有创造就业的增长。事实上，在农业排斥就业的情况下，总体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因为无法反映这一特定结构变化而大大低估了经济增长实际创造就业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观察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最好使用非农就业弹性概念。

如果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合在一起定义为非农部门，可以看到，非农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一直维持较高水平，1991～2007 年间平均非农就业弹性为 0.26。分阶段来看，1991～1997 年平均为 0.31，年平均增加就业 1306 万人，1998～2002 年为 0.16，年平均增加就业 548 万人，2002～2007 年为 0.35，年平均增加就业 1735 万人（参见图 1）。需要指出的是，1998～2002 年非农就业弹性之所以比较

低，主要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在此期间正处于攻坚阶段，大量就业岗位被摧毁，非农就业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改革带来的裁员所抵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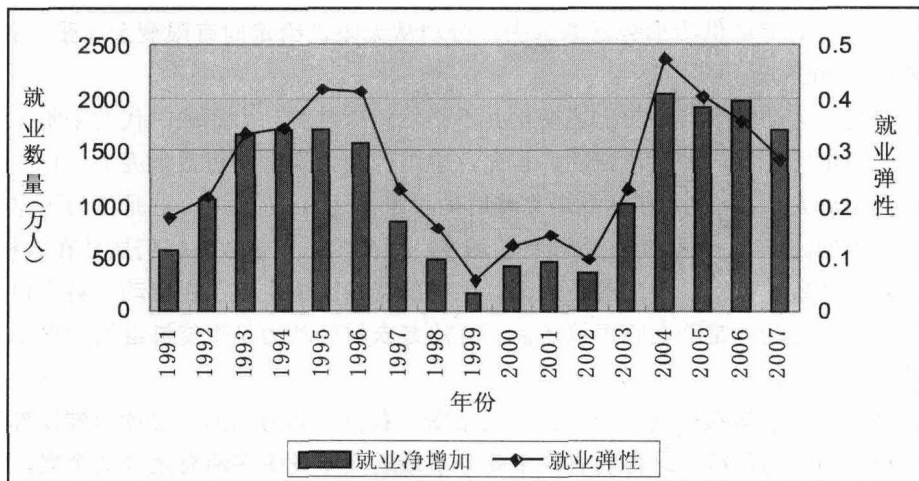


图 1 1991 年以来非农就业与非农就业弹性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经济增长的总就业弹性较低，但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没有创造就业，因为农业拉动就业作用的变化和劳动力市场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真实关系。分阶段来看，尤其从非农就业增长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在大量创造就业，尤其是 2002 年后，随着劳动力市场改革对就业的冲击逐渐结束，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重现较强的关联性，劳动力供不应求局面在很多地区呈愈演愈烈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又有很多人开始问：中国是否已经步入了劳动力短缺时代？

二、中国步入劳动力短缺时代了吗？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GDP 增长率已连续 5 年超过 10%，2008 年在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预计将保持 9% 左右的增长率，中国经济正在创造世界经济增长史上少有的奇迹。

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刺激了就业需求，最近几年新增非农业就业增长都维持在 1700~2000 万人之间。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转变的快速完成，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虽然劳动年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但每年的增量正在减少。

最新预测表明, 15~64 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 2014 年, 而 15~60 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 2011 年就会停止, 之后,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劳动需求强劲增长和劳动供给压力减弱导致劳动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无限的劳动供给形势逐渐远去, 劳动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剩余 (张车伟、吴要武, 2005)。

但是, 劳动供求形势的上述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时代的来临。这主要是由中国独特国情所决定的。首先, 中国劳动力资源绝对数量庞大,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4 年达到最高峰时的总量高达 9.97 亿人, 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其次, 中国存在着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 大多数人口仍居住在农村, 农村人口是城镇劳动供给的潜在来源。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在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后, 劳动力是否面临短缺还需要弄清楚农村劳动力是否能够继续向城镇非农经济部门转移。

有人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枯竭, 农村劳动力已无法继续为城镇部门提供足够的劳动供给, 这样的看法主要基于最近几年发生在沿海地区的个案, 但总体经济的宏观数据似乎并不支持上述看法。事实上,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一直呈加速趋势。1978 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7.92%, 2006 年增加 43.9%, 1978~2006 年城镇化平均速度为 0.93%。分阶段来看, 1978~1990 年平均城镇化速度为 0.71%, 1990~2000 年为 0.98%, 2000~2006 年为 1.28%, 很显然, 2000 年后城镇化的速度不仅没有减缓, 反而显著加快。从长期来看, 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最终会停止, 但问题是这种情况会发生在今天吗?

判断农村劳动力是否会继续向农村转移, 关键要看决定转移的因素是否发生了改变以及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农村劳动力转移之所以要向城镇转移, 主要是因为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存在着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较大差距。因此, 如果观察到两部门效率和工资差距缩小或者趋同, 那么, 转移动力就会减弱或者说消失; 如果差异继续存在或者进一步扩大, 那么, 转移将继续。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呈现扩大趋势。1978 年, 一个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所创造的增加值相当于 6.1 个农业劳动力, 2007 年这一数字变为 10.53^① (参见图 2)。造成两部门劳动生产率拉大的原因, 并非因为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下降或者缺乏增长, 而是因为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增加速度大大快于农业劳动生产率。

① 这里有关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使用 1978 年的不变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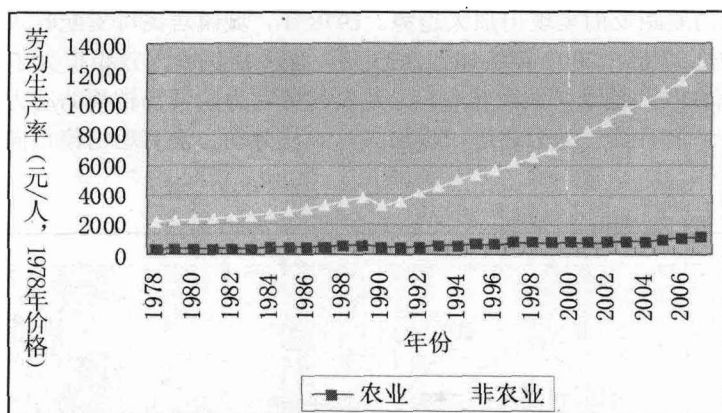


图 2 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一直保持较快增长，1978~2007 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4.29%；但与农业部门相比，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更为迅速，1978~2007 年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6.28%。农业劳动生产率不仅低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而且增长速度也低于非农劳动生产率，其结果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必然会进一步加大。这意味着推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向非农业部门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得到加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且这一差异不断被拉大，只能表明农村劳动力继续向城镇非农部门转移仍然有其合理性，并不构成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的充分条件，农村劳动力是否继续向非农部门转移还必须看两部门工资率是否存在差异。如果两部门存在着较大的工资差异，理性的个人就没有理由不选择进入工资更高的城镇部门工作。

然而，比较农业工资率和非农工资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由于农业工资无法从常规统计中得到，在这里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这项工作也只能留作为另一篇专文研究的课题。作为一种替代方法，作者在这里选择比较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及其变动。鉴于财产性收入和其他收入来源在城乡居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或者说工资性收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以近似地代替工资率差异。

从理论上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母”效应会倾向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并没有带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